

她世界

黎巴嫩三对夫妇展示：

性别平等从家庭开始

◆“有些男人对什么是男性气质有误解。他们认为男人应该专横跋扈或成为他家庭的主人。但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要取悦和安慰亲近自己的人。如果我的妻子一直操劳疲惫，我就不能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

——艾哈迈德·穆斯塔法，校长

◆“做家务是一种手拉手的伙伴关系，我更喜欢这样形容我们的状态，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家里的责任与妻子的责任是一样的。”

——哈立德，批发商

◆“婚姻是一种基于妻子和丈夫之间合作、管理和参与的制度，包括父亲像母亲一样在照顾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不会减损他的男子气概，也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使他处于劣势。”

——艾哈迈德·法基，生活技能教师

■ 何蒙/编译

从城市到农村社区和营地环境，黎巴嫩的家庭正在重塑传统的父权制角色，倡导性别平等。聚焦三对夫妇的生活，他们分享了自己在生活中进入性别平等状态的经验，包括家庭决策、儿童保育和家庭责任。

在家分担责任

44岁的校长艾哈迈德·穆斯塔法和36岁的科学教师萨米哈·吉姆拉维四年前结婚，他们育有一儿一女。

“分享的本质是把我们聚集在一起，让我们在一起。”这对夫妇解释说。

在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贾巴尔·巴达维街道的一间公寓里，丈夫艾哈迈德忙着在厨房为四口之家准备晚餐，他说：“我发现烹饪很有趣，但我的角色并不会就此结束，等我准备完食物后，还要打扫厨房，洗碗。”

与此同时，妻子萨米哈利用这段时间准备第二天的课程。“艾哈迈德在所有家庭事务中都支持我，让我有充足的时间照顾自己并完成工作，我不必为孩子们分心或为没有履行家庭责任而有压力。”

这种支持使萨米哈发展自己事业并继续学习。萨米哈已经完成了她的生物化学研究生学业，并打算继续学术研究以完成博士学位，“由于家庭和养育的压力，许多女性被迫放弃事业抱负。”艾哈迈德说，他喜欢萨米哈的雄心壮志。

艾哈迈德认为教育是改变对社会传统和家庭中角色看法的重要工具。他倡导参与式关系，以自己的生活为例，说明当丈夫和妻子平等分担责任时可以取得什么改变。艾哈迈德说：“许多人认为家务是女性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一种耻辱，我希望以身作则去突破。”

“有些男人对什么是男性气质有误解。他们认为男人应该专横跋扈或成为他家庭的主人。但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是要取悦和安慰亲近自己的人。如果我的妻子一直操劳疲惫，我就不能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艾哈迈德解释说。

艾哈迈德和萨米哈热衷于抚养他们的孩子。艾哈迈德的两个孩子（他们与母亲住在一起，但经常来看望他），分享价值观，并在家庭中灌输性别平等观念。“只要他们看到我履行职责，就会对他们造成影响。孩子们将通过我们来学习参与性别平等。在家里，每个人都平等地参与家务：孩子们在吃完饭后打扫卫生，并整理自己的房间。”

► 30岁的哈立德·纳斯尔和35岁的拉尼亚·赛义德轮流照顾他们的儿子瓦利德，不管是奶瓶喂养、儿童保育还是其他家务。

▼ 在家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与妻子平等地参与各种家务。

► 艾哈迈德·法基喜欢平等地参与孩子的成长。

(图片：UN Women/Marwan Tahtah)



为人父母的强大伙伴关系

30岁的批发商哈立德·纳斯尔和35岁的拉尼亚·赛义德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志愿者。他们一年多前结婚，育有一子瓦利德。这对夫妇重视夫妻关系，以及夫妻感情的基本要素：分享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这对夫妇结婚时，哈立德从艾因·希勒维营地搬到了拉希迪耶营地（两个都是巴勒斯坦难民营），以便更接近拉尼亚。他们共同为新家储存同样多的钱，共同建设新家。

这对夫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养育儿子瓦利德。他们轮流照顾孩子，包括晚上喂奶粉、工作时间育儿、养育孩子带来的额外家务……哈立德并不认为这是“任务分工”，而是一种手拉手的伙伴关系——“我更喜欢这么形容我们的状态，因为我认为自己在家里的责任与拉尼亚的责任是一样的。”

拉尼亚对平等分享的信念并非源于她自己的成长经历。她在一个女孩做所有家务的家庭中长大。“我爸爸从事农业工作，我妈妈经常帮助他。当妈妈回到家时，其他任务在等着

她——在没有父亲帮助的情况下打扫卫生、做饭和洗衣服。我模仿她的坚韧，但我不想像她一样累倒。我妈妈在四十多岁时就去世了，我认为这是由于多年来疲劳的积累。”

相关研究表明，家务劳动中传统的性别分工仍然是常态，85%的妇女报告从事家务劳动，而男子的这一比例为56%。

平等分享的概念在他们社区的大多数夫妇中并不常见，这对夫妇经常因哈立德参与家务和拉尼亚参与家庭决策而受到批评。“我认识的人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帮助他的妻子，她就会控制他，降低他的威望。”拉尼亚说。哈立德说：“我没有受到那些不承认男女伙伴关系重要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因为负面评论而停止。我和我的妻子在所有人面前为这段关系感到自豪。”

家庭平等，社会平等

38岁的生活技能教师艾哈迈德·法基和31岁的工商管理学生杜阿法拉已经结婚七年，有两个孩子朱里和纳赛尔。“从我们订婚的那一天起，我们一直在为培育一个建立在平等基

础上的小社会而努力。”这对夫妇说。

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保守的社会，但这对夫妇努力为他们孩子创造一个不同的环境并进行相关教育，远离性别歧视的观念。“婚姻是一种基于妻子和丈夫之间合作、管理和参与的制度，包括父亲像母亲一样在照顾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不会减损他的男子气概，也不会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使他处于劣势。”艾哈迈德说。

夜晚，艾哈迈德从他写的许多故事中选择一个新的睡前故事，轻声地给他的孩子读书。“从孩子出生开始，我就开始为他们写故事，涵盖重要的教育主题。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写了一系列以朱里和纳赛尔为主角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坚持在我的故事中赋予女性有影响力的角色，例如作为女主角和救世主的母亲，而不是她的角色局限于家务。”艾哈迈德说。

艾哈迈德在学校的社会工作中，在他为孩子们开展活动的个人时间里，都不曾错过倡导性别平等的机会。

这对夫妇认为，通过对话、文化规范和思想，改变是可能的。

2020年美国孕产妇死亡率上升

黑人远高于白人

■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孕产妇死亡率较前一年上升。其中，非西班牙裔黑人孕产妇死亡率显著增加，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孕产妇死亡率的2.9倍。

美国全国卫生统计中心隶属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这份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有861名女性因孕产相关原因死亡，而2019年为754名。2020年美国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活产婴儿有23.8名孕产妇死亡，而2019年为20.1名。

该报告也显示出美国日益扩大的不同族裔孕产妇死亡率的差异。2020年每10万活产婴儿中，非西班牙裔黑人孕产妇死亡人数为55.3人，是非西班牙裔白人孕产妇的2.9倍。

报告说，非西班牙裔黑人孕产妇的死亡率明显高于非西班牙裔白人孕产妇和西班牙裔孕产妇。2020年非西班牙裔黑人孕产妇和西班牙裔孕产妇死亡率较2019年显著增加，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孕产妇死亡率较前一年无明显变化。

报告还显示，孕产妇死亡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2020年美国25岁以下孕产妇死亡率为每10万活产婴儿有13.8名孕产妇死亡，25岁至39岁孕产妇为22.8名，而40岁及以上孕产妇为107.9名。40岁及以上孕产妇死亡率为25岁以下孕产妇的7.8倍之多。

报告称，世界卫生组织将孕产妇死亡定义为怀孕期间或妊娠终止的42天内，因怀孕相关原因或因怀孕而加重的疾病等原因所导致的死亡。

美国媒体报道说，新冠疫情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冠使女性怀孕期间患重症的风险大大增加。

日本2021年出生人口连续6年创新低

据日本媒体消息，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显示，2021年日本出生的婴儿数为84.2万人，较上年减少29786人，连续六年创新低。同时，死亡人数达到战后最多的145.2万人。结婚登记数为51.4万对，同比减少2.3万对，为战后最少。

报道指出，日本人口自然减少60余万人，创最大降幅。少子化加剧、人口减少势头不止，社会保障制度的维持也岌岌可危。此外，还有必要扩充应对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状况和生活变化的援助。

日本厚生劳动省指出，2020年为新冠疫情开始扩散的时期，许多人可能因对前景不安而没有怀孕生育的意愿。

(来源：中新网)

韩国2021年结婚人数首次跌破20万对

据韩媒报道，韩国统计厅日前表示，2021年，韩国结婚人数为192509对，首次跌破20万对，同比减少了20993对(10%)。该数值较1983年(41万对)最初统计时减少了一半。虽然有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结婚的情况，但单身人数增加等因素是造成结婚人数减少的基本原因。

报道称，即使结了婚，生育也会推迟。如果第一个孩子生得晚，便难以考虑要二胎，继而导致人口减少的担忧进一步增加。

2021年，韩国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为33.4岁，孩子上小学时，多数母亲已是不惑之年。而在两年前，以2019年为准，经济开发合作组织(OECD)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为28.3岁。

报道指出，韩国人从结婚到生育的时间间隔正在拉长。在2021年的新生儿中，结婚超过5年的夫妻生育的孩子达6.9万名，同比增加了1000名(1.8%)。与之相反，结婚2年内的夫妻生育的孩子同比减少到了1万名(-10.7%)，结婚2至5年的夫妻生育的孩子减少了4000名(-4.1%)。在这样的趋势下，35岁以上女性的生育率在升高。

(来源：中新网)

锐观察

“高龄”、大体重、才华、个性……

各国选美比赛不重外表，标准更多元

现年37岁的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女演员多米蒂拉·巴罗斯摘得2022年度“德国小姐”桂冠。为这项拥有95年的赛事续写了新历史。

“社交媒体绿色网红”

综合外媒报道，今年，“德国小姐”选举活动与往年大不相同：新的评选流程、网络直播，候选人的“使命感”更受关注。

夺冠的巴罗斯在巴西一棚户区长大。她长期在那里教街头儿童读书写字，并因此曾在纽约获颁联合国“千年梦想家奖”。2017年起，她创建了一个泳装品牌，为巴西的母亲们提供就业机会，她表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

此外，巴罗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等事业，在比赛中，巴罗斯时常会做出一些关于保护环境的倡议。也因这些贡献，现居柏林的她战胜了其他10名竞争对手，脱颖而出，成为新一届“德国小姐”。

选美标准逐渐多元？

这并不是“德国小姐”第一次刷新世界选美史。

2020年，里奥尼·夏洛特·冯·哈泽以35岁

“高龄”成为德国有史以来岁数最大的“德国小姐”。

当时，冯·哈泽是当年大赛中岁数最大的选手。她本人平日经营一家网店，出售仿古服装，而且还是三个一岁男孩的母亲。主办方表示，冯·哈泽的当选标志着德国选美比赛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外表不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品格开始占据更大的比重。

据了解，“德国小姐”比赛的选拔标准是：参加者必须拥有德国国籍、年龄在18岁至39岁并不曾发表过任何裸照。根据2018年修订的最新规定，选手可以是已婚并已生育的女性，18岁以下女性禁止参赛。

其实从数年前开始，“德国小姐”的赛事概念就在不断改变：最重要的不再是身着基尼出现在男性为主导的陪审团前，而是要介绍自己的“使命”。

宗旨变为：“谁行动了，谁系纽带”——纽带依然存在，换装和走秀也依旧保留。

主办方最看重的是个性和多样性，他们要找的是坚定走自己的路、心中有明确目标并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女性，个性与态度非常重要。

她们可以有着不同的肤色、是游戏玩家、是企业家、是环保主义者、是艺术家、是运动员、是母亲、或者是别人眼中的“胖子”。比如，

数名黑人进入了今年的决赛，其中一位积极参与“黑命贵”运动；还有一位参赛者跨性别人士。不少社会活动家也通过比赛发声：一位有性侵遭遇的选手希望能替儿童性虐待的受害者发声；另一名单手特别呼吁女性们实现财政自主……

不过，这样的变化也受到争议，有人认为这样的选美比赛更像是一个为女性开放的平台；但也有人认为这样失去了“选美”的意义；还有一些网友表示，仿佛在看一场“政治正确”的表演秀……

选美应折射什么样的时代价值观？

变化不仅发生在德国。2017年，“冰岛小姐”的评选放宽了标准，这给了体重达到三位数的斯特凡妮娅·塔拉·特拉斯塔多蒂尔参加比赛的机会。这位非传统意义上的“佳丽”，成为五名决赛选手之一。

2018年，意大利的选美比赛上出现了残疾人的身影。一位名叫基亚拉·博尔迪的18岁女孩戴着左腿的假肢站上了决赛舞台。

而随着选美标准多元化，候选人有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人们对选美的标准有了更高的“价值观”要求。

2021年，三位女士对“法国小姐”提出了诉

讼申请，认为这些公司歧视性的选拔标准违反了法国劳动法。据了解，原告因“年龄、身高不符合要求，在公共场合饮酒和吸烟以及有文身”而被拒绝参加比赛，而在法国的劳动法中，禁止公司以“道德、年龄、家庭状况或身体外观”为由进行歧视。此事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选美标准该折射什么样的时代价值观问题逐渐受到关注。

与此同时，“法国小姐”近年在总决赛环节中增加的文化基础测试环节受到关注：29名候选人需要回答40道不同领域的题目，不仅涉及时事政治、媒体娱乐、历史地理等常识问题，还包括英语翻译和法语语法等语言问题。有网友对“才貌双全”的评选标准表示赞赏；但也有网友表示，过于复杂的程序，越来越让选美大赛变成一个“无伤大雅”的综艺。

另有观点指出，选美比赛发迹于时装公司举办的泳装比赛，后来逐渐成为女性在男权社会寻求财富与地位的一种途径。而现在，在任何更加开放、男女更加平等的社会中，通过选美比赛“鲤鱼跳龙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越来越小，所以选美的参与程度和关注程度自然也就越来越低，最后的归宿或许就是一个综艺节目？

(来源：欧时网)